

赵元任与中国符号学研究

赵家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赵元任1926年发表的《符号学大纲》不仅提出了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必要性,而且构建了清晰的普通符号学学科体系。在此后的相关文献中,赵元任应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了汉语语言系统。这说明无论在世界普通符号学的研究史上,还是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符号学体系方面,赵元任都是不应被忽略的先驱。

【关键词】 赵元任; 符号学思想; 普通符号学; 中国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06)01-0092-04

1926年,赵元任发表《符号学大纲》,提出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必要性,概述普通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和体系^[1],比皮尔士相关论述的发表还早了几年;1968年,他又在《语言和符号系统》中,将自己的符号学思想向信号通讯和汉语符号学两个方向作了深入延展^[2];1973年,他又发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把符号学理论应用到汉语语言中进行专门的讨论^[3]。但是赵元任在符号学领域的思想向来较少受到关注。1993年,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4]历数符号学史上凸现光芒的种种理论的时候,也未曾提及赵元任67年前发表的《符号学大纲》这篇不可多得的符号学文献。

如今,西方符号学学派林立,研究领域触及人文社会诸多学科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学、传播学、文艺学等学科的实用工具和方法论平台。而中国符号学至今也没有切己的独立话语,应用的都是西方现成的符号学话语体系,往往是临时抓来,生搬硬套。因此,研究赵元任的符号学理论,一方面有利于全面总结大师的学术成就,不致有什么疏漏;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寻找中国现代符号学自己的话语源头,为日后建立完整有效的中国符号学理论系统打下基础。

一 赵元任对符号学的可贵探索

上文所提赵元任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三种文献是赵元任符号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明确提出建立

普通符号学学科,构建符号学的研究框架,是赵元任在符号学领域最早最突出的成就。而此后的关注符号学的实际用途,着力联系符号学理论,尝试改造汉语语言符号体系,则是颇具赵元任特色的实用主义研究路线。

(一)明确“符号”概念的定义

在《符号学大纲》中,赵元任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来界定“符号”的概念。他用举例归纳的方法从符号的成素、构成、组合、对象、边界和产生等方面对“符号”进行了细致描写,颇似他在音位学著作中的细腻手法。

赵元任指出,符号本身的成素的素材完全没有限制,数字、音乐的谱号、图书编号、象形字、象声词、旗帜、语言等等,都是符号。这是一个重要的表述,这表明1926年赵元任试图构建的是“普通符号学”,而不是“语言符号学”。

符号与它的指代物关系究竟如何?赵元任认为,在符号的构成中,最为常用的符号的基本成素有空间、时间、声音、颜色、数和强度。符号就是把这些成素组合起来,而且最常用的组合方法,就是把一些不同的成素混称为一个符号。比如一个方桌,看见一个正方形的是方桌,长方形的也是方桌,摸着了硬的感觉也说是方桌,桌子就是这些性质的组合体,除掉这些感觉的成素之外,并没有一些有这些性质的桌子,这组合体中的成分没有什么天然的联系,其中唯一的联合的媒介就是碰巧

[收稿日期] 2005-08-17

[作者简介] 赵家新(1966—),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生出联想的关系。

同时,赵元任也强调,虽然样样事物都可以当符号,但未必就是符号。有所代表的事物,比如甲事物代表乙事物,甲就是乙的符号,乙则是甲的对象。两者以联想的方式连接,联想的程度越深,符号就越有效。符号与对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两者可以动态转化,也可以与其他事物转化,从而形成复杂的符号与对象的层次和结构关系,不可能清晰地划分开来。这种“动态”的符号意义观表达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这一点,赵元任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中明确指出:“任何语言,包括汉语在内,最重要、最普遍的属性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一个符号可能代表多个对象,有可能造成解码者(赵元任称之为“用符号者”)某种意义的“含混”;一个对象也可能用多个符号代表,可能造成解码者认识上的“重复”。这些概念以后在符号学的各分支学科中都是重要的研究章节,如符号的歧义性、冗余度研究等等,充分体现了赵元任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前瞻性。

(二)构建符号学的研究框架

1926年,赵元任在《符号学大纲》中明确提出,应该建立符号学这门学科,通过这样一门学科切实研究“符号”,解决人们使用符号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便。他说:“虽然有好些学问里的符号系统十分发达,而在别门学问里研究到事理上与前者很相近的题目,还不会去采用或仿效它,还只晓得用很笨的符号。……一个人断难把各种学术里的符号都学来了预备着用。所以最好要有一个普遍的符号学。”

赵元任构建符号学学科的出发点是“实用”的,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符号”与符号的使用,构建学科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科学描述符号现象,解决符号使用中的问题。他所研究的重点也放在符号的界定、应用和符号好坏的辨别原则上。之后把符号学理论应用到汉语语言符号系统中,也是出于把符号学作为一个工具,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汉语,以期发现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而当今国内学术界把符号学的众名词拿来作时髦与深奥的装饰,实在是对符号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论源头的南辕北辙。

《符号学大纲》为普通符号学搭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框架。根据符号学的功用,赵元任把符号学分为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两大领域,

理论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重点:理论符号学研究符号的性质、调查与分析各门学科里所用的符号系统;应用符号学则研究符号好坏的原则并改良不好的符号,创造缺乏的符号。

循着理论与应用的框架,赵元任对符号学的理论展开了较完整地梳理与应用研究,如符号概念的界定,符号的基本成素与成素的组合,符号的边界,符号的产生,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符号的功用,符号的原则等等。在《符号学大纲》一文中,赵元任探讨了符号学学科的众多基本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大框架,也有小论题,可以说,在构建符号学学科伊始,赵元任就为符号学搭好了自己的学科框架。这样的符号学框架,即使以今天关于“符号学”的严式定义“有关记号的,或有关记号过程,或有关记号功能的研究”和今日多数符号学专著“以界定记号或记号过程开始,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筑或追溯有关记号理论的符号学体系”^[4]来观照,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此后,赵元任又接受了莫里斯的观点,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本身的“符号学”和“意义学”、“语用学”三部分。他在《语言和符号系统》中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他符号论里头分三部分,一个就是符号的本身,他叫它 syntactics……是一切符号的本身的结构。第二是 semantics,就是意义学,就是说符号跟意义的关系,什么符号代表什么意义。第三叫 pragmatics,这方面讲符号跟用符号者的关系,就是什么样情形谁怎么样用符号。”此时的赵元任已经扭转了研究思路,更多地关注起实用主义的信号通讯学研究和汉语语言符号系统的改造问题了。

(三)尝试用符号学理论改造汉语语言符号系统

在《符号学大纲》中,赵元任详细描述了一个好的符号系统应该符合的16个条件。之后《语言问题》将之整合为5条,到了《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赵元任将之重新归纳为良好的符号系统所需具备的9个条件:简单和优美,通讯性能,便于产生、传递和复制,大小适中,节省数目,符号复合体的结构跟对象的结构有关联,辨别符号的能力和作为同义词的适宜程度,普遍性。然后以汉语语音和文字为个案,从这9个条件入手考察汉语的运用,对汉语符号系统进行单纯描述性的评价。赵元任并从这个评价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出自

己的大胆设想,也是赵元任一直都主张的:把汉语拢成一个更紧凑的系统,拟出一个“总体模式”。比如,排除古汉语的一些已被各方言区舍弃的语音特征,选择最常见的字代表比较生僻少用的同音字,等等,以便使汉语使用更加方便、传播信息更加顺畅。

二 对赵元任符号学思想的评价

作为建立现代普通符号学体系的先驱,赵元任1926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符号学大纲》一文,提出建立“符号学”,而不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以至约翰·洛克以来西方哲学思潮中历史悠久的“符号哲学”。赵元任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符号学’这三个字本来不成名词;这篇东西就是要陈说在学术当中有建立一种符号学的可能,所以加了一套引号来把它介绍进来。在西文中 symbolics、symbology (或简作 symbology) 这类名词,也曾见过,但在这类名词下所论的问题,都有点偏重符号的哲理,不是本篇所论普通的符号学。”赵元任在这里还着重指出了自己要建立的是“普通”的符号学,而不是“语言符号学”。从现代符号学史的角度看,业界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始祖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实用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分别于1913、1914年先后逝世,正如他们素未谋面,却不约而同地在大西洋两岸开创了符号学的传统一样,两人的符号学思想也不约而同地发表在其身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年出版,称符号学为 symbology; 1931—1935年间,皮尔士《论文集》问世,把符号学称为 semiotics, 因此才有了此后符号学由 symbology、semiotics 两个名词表示的现象。

赵元任发表《符号学大纲》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了索绪尔的大作,但索绪尔,甚至追随其后的叶尔姆斯列夫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都只是潜在采取了“语言符号系统是普通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的认识论前提,其具体研究仍限于语言学领域,没有真正提出建立普通符号学体系^[4]。

作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的赵元任,也一定受过鼎鼎有名的皮尔士的实用哲学与逻辑学思想的熏陶,皮尔士对符号的关注,对赵元任自然也会有所启迪,但当时 semiotics 显然还没有正式成为符号学的专有名词。而且皮尔士在世时,偏重的是记号和逻辑的探讨,并未着意建立符号学学科体

系。

赵元任把普通符号学当作一门专门的学科提出来研究,并且为其拟定相对明晰的学科架构,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确是开风气之先。他在《符号学大纲》中说:“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因此,提出建立符号学学科,是赵元任学术思想的自然发展,这使得他不仅是中国现代符号学的最早涉猎者,在世界普通符号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可忽略的先驱。

《符号学大纲》之后,赵元任显然受到了皮尔士和实用主义者莫里斯的影响,其符号学思想在其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实用主义的倾向。在《语言问题》中,赵元任提到了皮尔士和莫里斯。他说:“与信号学有关系的,说起早一点儿的来历么,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哲学家 Charles Peirce,他很注重符号论,他用 sign 这个名词代表一切作记号的东西。特别注意他这一派的学说跟注意这些问题的现代人当中么,有芝加哥的 Charles Morris。”莫里斯的试图以科学路线(而不是“玄学”路线)统一人类知识的抱负,对上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而赵元任早在1926年《符号学大纲》中就显示出来对应用符号学的重视,比如改造符号的设想,此后一直着重这条思路的发展,一再提出改造汉语语言符号系统的必要性;同时重视信号的传通能力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比如赵元任曾经应用符号学细致图解了扬声器、广播、电视等17种信号的传送方式^[1]。

三 中国符号学的最早话语源头

赵元任的符号学理论,尤其是他对汉语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是真正的“中国符号学”的最早的话语源头。赵元任1926年《符号学大纲》所使用的例证,包含有大量活生生的汉语口语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背景。《语言问题》开始关注汉语语言符号系统的分析,到1973年的《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则专门联系符号学理论,深入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建设汉语语言符号系统。除此之外,赵元任在《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中,还提到了中国古诗的韵律、象形字和会意字的符号表义作用。文中开首举了岑参的离别诗为例,说明中国诗的韵律的符号作用:入声作为能指,它的符号形式是

迫促,在诗中的所指是冰天雪地;平声的符号形式是流畅,所指是春暖花开^[3]。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极富于象征表现,是符号学研究的适当对象。赵元任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指出了中国符号学富有特色和趣味的研究内容,这对建立时至今日仍没有成型的“中国符号学”,是极有启发的。

在寂寞了多年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符号学研究终于活跃起来。从80年代初期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开始向国内引介索绪尔、巴特等国外符号学的主要思想和符号学的基本理论。1987年,国内符号学界开始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等符号学具体理论进行更细致、更深入地分析研究。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被应用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中,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1994年后,研究逐渐深入的国内符号学界开始质疑国外符号学家的部分观点,引进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号学等分支符号学思想,对体语符号等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予以关注,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同时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和历史典籍中的符号学思想。

到现在,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一个致命缺陷也日益凸显出来:长期以来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并没有超越综合、模糊意义上的“中国的符号学”的概念,“中国符号学”本身并不真正明晰,成体系的“中国符号学”核心理论、原则与框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可喜的是,当前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意识

到“中国符号学”作为一个独立而普遍的符号学体系的重要性,正在反复着意强调“中国符号学”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符号学”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促动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现代化发展,二是促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自我反省和调整,三是促动中西方社会人文学术传统的有效沟通。质言之,建构“中国符号学”,目的不在于争夺政治与国别领域的话语权,而是因为符号学对象涉及文化史各个领域,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与西方文化形态差异极大,完全应用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符号学话语研究中国本土的符号现象,不仅处处掣肘,也不利于符号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更不利于符号学成为沟通中西方传统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利器。近些年有些学者开始使用符号学的话语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流行文化现象,台湾学者周庆华则尝试建立“材料是传统中国的,见解则是现代的”^[5]的中国符号学,都是中国符号学建构的努力。而上个世纪赵元任在符号学领域大胆、执著的学术努力,是建立中国符号学的先驱,也是动力。

【参考文献】

- [1] 赵元任. 符号学大纲[M]//吴宗济,赵新那.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77-208.
- [2] 赵元任. 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 赵元任.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M]//吴宗济,赵新那.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77-889.
- [4]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5] 周庆华. 中国符号学[M]. 台北:台湾扬智文化出版公司,2000.

【责任编辑:邵霭吉】

Zhao Yuan-ren and China Semeiology Research

ZHAO Jia-xin

(Faculty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In 1926 Zhao Yuan-ren published *Outline of Semeiology*. The book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semeiology, but also put forward clear-cut system of general semeiology. In the succeeding related articles, Zhao Yuan-ren applied theories of semeiology in analysis of Chinese linguistic system, which shows clearly Zhao is the indispensable front-runner and pioneer of Chinese semei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Zhao Yuan-ren; semeiology thought; general semeiology; Chinese semeiology research